

607-52/3725

0094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



三次经济调整之异同及其经验教训

程小俊 储祥林

中共合肥市委党史办公室

1991年7月

三次经济调整之异同及其经验教训

内 容 提 要

建国以后，由于屡屡发生经济过热的现象，因而不得不多次进行经济调整。其中主要的是六十年代初的经济调整，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经济调整和目前正在进行的治理整顿。本文拟将这三次调整作一异同比较，并试总结其经验教训。

总的来讲，这三次经济调整都是由经济过热引起的。由于经济过热而不得不进行经济收缩，修正经济发展目标，调整经济发展政策，因而这三次调整有许多惊人的相同或相似之处。第一，三次调整所面临的一些经济问题是基本相同的；第二，三次调整初期都存在着不同的思想认识，影响了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第三，三次调整都确定了一个“八字”方针，采取了一些相同的经济措施；第四，三次调整时期，都是农业率先得到恢复和发展。

但是，三次经济调整前后相隔近三十年之久，作为不同的矛盾事物，必然也存在着许多明显的不同特点。第一，三次调整时的经济环境不同；第二，三次调整的难度不同，调整的手段不同；第三，三次调整的内容有些不同；第四，三次调整的指导思想不同。

三次经济调整，使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既然交了学费，就应该学习到知识，从三次调整的史实中，我们可总结出一些基本的经验教训。第一，必须彻底克服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制定并执行符合国情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第二，必须改革旧的经济体制，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体制；第三，必须合理地确定和安排国民经济中的重大比例关系；第四，必须注意保持财政、信贷、物资、外汇各自的和相互之间的基本平衡；第五，必须不断优化经济结构，大力提高经济效益；第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紧密依靠人民群众。

只要我们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指导实践，注意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

三次经济调整之异同及其经验教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多年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在探索的道路上也遇到了严重的挫折，经济发展上几次大起大落，由于屡屡发生经济过热，而不得不多次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规模的调整。第一次是六十年代初期对“大跃进”的经济调整；第二次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对“洋跃进”的经济调整；第三次是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对“经济发展过热、经济秩序混乱”进行的治理整顿。本文拟将这三次大规模的经济调整作一异同比较，并试从中总结其基本经验教训。

总的来讲，这三次经济调整都是由经济发展过热引起的。由于经济过热产生了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因而不得不进行经济收缩，修正经济发展目标，调整经济发展政策。因此，这三次经济调整在许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同或相似之处。

第一，三次调整时面临的一些经济问题是基本相同的。

1、基本建设规模庞大，固定资产投资膨胀。1958年“大跃进”运动发动以后，为实现钢产量的连续翻番，基本建设规模不断扩大。1958—1960年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1007.4亿元，比1953—1957年五年总额588.47亿元还多71.2%^①。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了一些过高的、不切实际的口号和目标，结果基建规模再度急剧扩大。1978年的基本建设总投资为500.99亿元，比上年增长了31%。八十年代中后期，由于急于翻两番和受高消费思想的影响，各地都大上工业项目，兴建楼堂馆所，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不断膨胀。1988年，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高达4314亿元^②。

2、国民经济中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经济结构趋于恶化。在1957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的比重占43.3%，轻工业占31.2%，重工业占25.5%。而到1960年，农业的比重下降到21.8%，轻工业下降到28.1%，重工业高达52.1%。1958—1960年，积累率分别高达33.9%、43.8%和39.6%。“洋跃进”时，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问题也十分严重。在1978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的比重为24.8%，轻工业为32.4%，重工业为42.8%。同时煤炭、电力工业发展缓慢，交通运输业严重滞后。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工农业的比例关系再度失调，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

业所占的比重由1954年的29.7%下降到1958年的24%左右。同时加工工业盲目发展,能源、交通等薄弱环节则更为薄弱。

3、通货膨胀严重,物价普遍上涨。“大跃进”期间,财政、信贷严重失衡。1958—1961年四年间,国家财政赤字累计达180.3亿元,银行共增发货币73亿元。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引起通货膨胀,推动物价上涨。1960、1961年全国零售商品物价上涨了3.1%和16.2%。第二次调整初期,曾出现了创记录的财政赤字。1979年财政赤字高达170.6亿元,当年银行增发货币58亿元,物价上涨2%;1980年财政赤字127.5亿元,银行增发货币76亿元,物价上涨6%。八十年代中后期,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的问题更为突出。1984—1988年间,国家财政累计赤字高达275.5亿元。同期年物价上涨率分别为2.8%、8.8%、6%、7.3%和18.5%。

4、工业高速增长,经济效益下降。1958—1960年,工业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高达54.8%、36.1%和11.2%,但是,由于兴建大批的“小、土、群”企业,废除了原有的规章制度,打乱了原有的协作关系,结果经济效益显著下降。生铁合格率,1957年为99.4%,1960年下降到74.9%。1977、1978年的工业发展速度也是相当快的,但是经济效益差的情况并没有多大改变。1978年,独立核算的国营工业企业亏损面达24.3%。1984—1988年间,我国工业生产以平均每年17%的超高速增长,但经济效益并没有显著提高,有些指标甚至还有所下降。据统计,1984—1988年,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的可比产品成本降低率由-1.3%下降到-12.3%。

第二,三次调整初期都存在着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影响了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

从1959年到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决定从1961年起,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然而,当时一些同志错误地认为主要是农业发展落后,拖了后腿,而工业生产则没有多大问题,可以继续“跃进”,因而对“八字”方针执行不力,工业调整工作进展缓慢。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大会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经过讨论,对调整国民经济的迫切性的认识有所提高。同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5月上旬又召开了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比较全面深刻地分析了当时国民经济的情况,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办法,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推动了调整工作的进行。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党中央着手解决我国国民经济中长期积累起来的问题,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提出用三年的时间调整国民经济。然而许多同志对调整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认识不足,各部门、地区和企业执行调整政策不力。1

1979、1980年，基建总规模没有压缩下来，引进项目该停的也没有停下来，地方和企业又盲目地上了一批新项目，加上其它一些原因，结果国民经济又出现了新的困难。对于这种情况，国务院于1980年10月和11月先后召开了全体会议和省长会议。中共中央又于12月召开了工作会议，进行了认真的反思，统一了思想认识，作出了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政治上实行进一步安定的重大决策。此后，调整工作才比较顺利地进行了。

1984—1988年间，我国工业生产一直超高速增长，经济发展严重过热。在这期间，中央曾两度实行紧缩政策，但由于对问题认识不足，没有真正下决心进行调整，结果紧缩政策都半途而废了。到1988年8月，几年积累的过大需求，推动物价大幅度上涨，终于诱发了全国性的挤兑存款、抢购商品的风潮，致使经济工作中多年积累起来的问题全部暴露出来，我们不得不再次痛下决心进行全面的治理、整顿。1988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然而这一次调整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些地方为了局部利益，“见到红灯绕道走”，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有不少人错误地认为治理整顿是一种倒退，对中央的方针政策持抵制态度。1989年，党中央在制止动乱之后，于11月初召开了十三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决定》正确地分析了经济形势，提出了治理整顿的具体目标和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从此，治理整顿工作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第三，三次调整都制定了类似的基本方针，采取了一些相同的经济措施。

三次调整都制定了一个“八字”方针。第一次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第二次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第三次是“治理整顿、深化改革”。

三次调整采取的经济措施有些也是基本相同的。

1、压缩基建规模，降低工业速度。第一次调整时，中央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措施，大幅度地压缩基建规模，降低工业发展的速度。基本建设总投资，1960年为388.7亿元，1962年下降到71.26亿元；1961年工业生产比上年下降了38.2%，1962年下降了16.6%。1979、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都曾大力压缩基建规模，降低工业发展速度，但执行的结果并不理想。1981年调整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当年基本建设完成投资总额是442.9亿元，比上年减少了21%；工业增长速度由上年的8.7%降为4.1%。第三次调整时期，由于我国的经济结构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宏观上压缩的是以基建投资为主的全社会固定资产的总投资。198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一年减少了近500亿元。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由1988年的20.7%，下降至8.3%③

2、平衡财政、信贷，稳定金融、物价。第一次调整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压缩财政支出，压缩银行贷款，回笼货币，稳定物价。1962—1964年实现了财政收支基本平衡；1963—1965年，全国零售物价分别下跌了5.9%、3.7%、2.7%。第二次调整初期，曾出现了创记录的财政赤字，银行发行了大量货币，但这种局面到1981年后得到了扭转。1981年财政赤字为25.4亿元，比上年减少80%，银行信贷基本平衡，货币发行量大幅度减少，物价上涨幅度由上半年的6%降为2.4%。第三次调整之初，执行财政、信贷双紧政策。目前国家的财政状况尚未好转，但在稳定金融和物价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89年，全年发行货币212亿元，物价上涨幅度逐月回落；1990年，全国零售物价仅比上年上涨2.1%④。

3、调整农村政策，扶持农业生产。第一次调整时，针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穷过度”、“平调”以及办公共食堂这些严重挫伤广大社员积极性的做法，中央决定调整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关系，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对“平调”坚决退赔，停办公共食堂。国家对农业投入了较多的劳动力，到1962年，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国家还大幅度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减少粮食征购量，鼓励社员经营各种家庭副业，恢复农村的集市贸易。第二次调整时期，正值我国农业改革兴起之际，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各种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建立，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另外，国家还采取了一些其它措施，扶持农业生产。如减免贫困地区的农业税，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鼓励农业的多种经营，发展农村的乡镇企业。第三次调整时期，国家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采取措施发展农业生产的。一是保持农村基本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深化农村的改革；二是增加农业投入，增强农业发展的后劲；三是推广和发展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

4、加强对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三次调整时期，国家为了便于进行宏观上的调控，都采取了一些措施，加强对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第一次调整时，中央曾制定了《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调整了经济管理体制，规定经济管理大权应集中到中央和中央局；所有生产、物资、劳动、收购、财务活动都要执行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帐的方针，不得层层加码，要顾全大局；货币发行权归中央，财权集中，各级都不允许搞赤字预算。第二次调整时期，国家一方面进行经济体制的局部改革，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另一方面为保证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也采取了一些必要的集中措施。如1981年1月，国务院作出《关于切实加强信贷管理，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

决定》，规定要保证货币发行权集中于中央；坚持财政信贷资金的管理原则。第三次调整时期，我国经济体制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地方有了较大的自主权，而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则大为削弱，这对经济调整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为此中央采取了一些必要的集中措施。在物资方面，适当提高重要物资由国家统一分配的比重；在金融方面，进一步强化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职能；在财政方面，适当提高地方上交国家财政的数额。

第四，三次调整时期都是农业率先得到恢复和发展。

由于几次调整时期都比较注意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扶持农业生产，所以在这几个时期，农业都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第一次调整时，调整工作首先是在农村展开的，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农业生产力和生产水平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1962年全年农业生产比上年增长6.2%，结束了前三年连续下降的局面，而同年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却进一步放慢，比上年下降了16.6%。到1963年，农业生产已全面好转，而工业生产则刚刚开始恢复。第二次调整时期，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79—1982年间，农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分别为8.6%、3.9%、5.7%和11%，而工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分别为8.5%、8.7%、4.1%和7.7%，农业生产的发展明显快于工业生产的发展。第三次调整时，1989年农业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了3.3%，粮食产量结束了前四年的徘徊停滞，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同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8.3%，但生产形势是很不稳定的，到了下半年工业生产速度迅猛下降，第四季度出现了负增长，跌入低谷。1990年，农业生产全面增产，工业生产处在逐步回升过程中。农业生产的率先恢复和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有利于调整工作的胜利完成。

另外，为了保证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完成，几次调整时期，都在政治方面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二

尽管这三次经济调整有着许多惊人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但是作为不同的矛盾事物，每次调整也有着自己的特点。尤其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治理整顿与第一次经济调整相隔近三十年之久，我国的经济运行机制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而更具有许多明显的不同特点。

第一，三次调整时的经济环境不同。

从总的经济形势上看：第一次调整发生在“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当时工

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城市居民吃穿紧张，农村发生严重的饥荒。第二次调整发生在十年动乱和“洋跃进”之后，面临着基建规模庞大，工业内部比例失调，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等严重的经济问题。这一次治理整顿则是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历史性成就的情况下发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城乡居民生活明显改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多年积累起来的问题也逐渐反映出来，突出地表现在通货膨胀明显加剧，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经济秩序发生混乱，等等。

从经济运行机制上看：过去两次经济调整处在高度集中，以计划手段为主的产品经济时期，而现在是新旧体制交替，在向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有计划商品经济过渡的时期。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二五”时期为38.6%，在“五五”时期为32.8%，而到1988年则下降到22.4%；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六、七十年代一般为60%左右，到1988年则下降为47.2%；前两次调整时期，绝大部分生产资料是由国家调拨的，而现在由国家分配的生产资料不到30%。由于中央直接掌握的财力、物力相对减少，因此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能力已大为削弱。

从对外经济联系上看：第一次调整时期，由于西方国家继续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苏联、东欧与我国的关系又急剧恶化，所以当时对外经济交流微不足道。第二次调整时期，我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对外经济交流迅速发展，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11.4%的基础上，逐年上升。十年对外开放，使我国的经济逐步走向世界，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988年已达到27.6%。这说明现在我国经济对国际经济的依赖程度和可借助程度比前两次调整时期更强了。

第二，三次调整的难度不同，调整的手段也有所不同。

就调整所面临的问题而言，目前正在进行的治理整顿所面临的问题比前两次调整时要更为复杂一些。从总量上看，前两次仅仅是投资膨胀，而这次是投资和消费双重膨胀；从结构上看，前两次是重工业超前发展，而这次是加工工业超前发展；从农业生产上看，前两次主要是解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问题，而这次除了需要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要解决农业生产条件改善的问题。在治理整顿开始之后，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市场疲软，资金紧张，工业增长速度回落过猛等。另外，如前所述，经过多年改革，实际经济生活已大大不同于以往，前两次的某些调整措施的实施条件已不具备。这一切就决定了这次调整比前两次更为艰难复杂。

由于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三次调整所运用的手段也是不尽相同的。六十年代初进行调整时，把“大跃进”期间下放的权力重新收归中央，实行中央集中管理。由于权力

高度集中,所以调整工作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段进行的。第二次调整时,改革刚刚起步,整个国民经济仍在高度集中的旧体制下运行,所以调整也还是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进行的。如为治理通货膨胀,1981年国家曾采取行政措施一度冻结了地方和企业的银行存款。第三次调整时,由于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已不可能完全依赖行政手段来进行调整了,因而是采取行政、经济、法律手段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调整的。一方面继续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来干预国民经济,如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治理整顿后,国务院连发了“四十道金牌”(条例、决定、通知),实施“双紧”政策。另一方面又运用经济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如在物价上涨时两次调高了银行存款、贷款的利率;在物价平稳时,又调低了银行的存款、贷款利率。这次调整还运用了一些法律手段。

第三,三次经济调整的内容有些不同。

前两次调整主要是进行总量调整,而第三次调整既进行总量调整,又注意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一次调整,主要是调整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调整的结果,虽使国民经济中的重大比例关系趋于基本协调,但是并没有实现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第二次调整时,整个调整工作也是围绕着总量调整来进行的,主要是调整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虽然当时曾提出要加强农业、能源、原材料及交通运输等薄弱环节的建设,但实际上调整时期及调整结束以后,都没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第三次调整时由于加工工业与基础工业的矛盾相当突出,市场疲软使得经济结构中的问题大量暴露;也由于总结了四十多年来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认识到经济调整不仅要解决表面问题,更要注意解决深层次的问题。目前,治理整顿已完成了总量紧缩的任务,现正集中力量进行结构的调整。

第一次调整时,由于受历史的局限,不仅没有改革原有的经济体制,反而不适当地强化了这一体制。第二次调整时,正值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际,调整的方针中,明确地提出了要改革不合理的管理体制。当时除在农村实行大规模的改革外,在工交财贸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如实行地方财政包干,扩大企业自主权等。第三次调整时,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是紧密相联的。治理整顿期间,深化和完善经济体制改革,重点是深化企业改革和健全宏观调控体系。

第一次调整时期,虽然关闭了不少消耗多、成本高、效益差的“小、土、群”企业,但是当时对提高经济效益的问题重视不够。第二次调整时,明确提出要“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⑤,但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第三次调整时,对我国国民经济中效益差的问题,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为纠正片面追求产值,忽视经济效益的偏向,1989年以来,国家统计局在公布若干重要经济

指标时，增加了工业资金利税率、工业能源消耗综合降低率等内容，1991年根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全国的工业企业广泛开展了“质量、品种、效益年”的活动。

第四，三次调整的指导思想有所不同。

第一次调整在指导思想上，当时绝大多数同志虽然认识了三年“大跃进”的错误，认为应该进行经济调整，但是左倾冒进的思想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清理。当时不准批“大跃进”，还要年年高举“三面红旗”；继续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错误地把国民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理解为波浪式发展规律的具体形式，认为经济调整只不过是两次“跃进”间的过渡。

第二次调整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因而能够从指导思想上纠正左的错误，认真总结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对当时的国民经济进行了清醒的、科学的分析，充分认识到调整的必要性。邓小平同志当时曾指出：“如果不调整，该退的不退或不退够，我们的经济就不能稳步前进”，“这次调整是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正确方针、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是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纠正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的进一步贯彻”^⑥。

这次治理整顿在指导思想上认真总结和分析了十年改革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注意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具体来讲：一是说明当前的经济问题是多年积累下来的，只有看清这一点才能深刻理解治理整顿的必要性和艰巨性；二是客观地承认党中央、国务院的工作存在失误，对近几年来出现的问题负有责任，并总结了经验教训；三是分析了治理整顿以后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强调必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坚定贯彻治理整顿的信心；四是认识到建设不能急于求成，改革不能急于求成，治理整顿也不能急于求成。提出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

另外，几次调整时期的国内国际的政治环境有所不同，这对经济调整工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

三次经济调整，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付出的三次大的代价，有人称之为“交学费”。既然我们已经交了一笔又一笔的学费，那么又应该学习到什么知识呢？据以上比较的内容及其它史实，我们可初步总结出一些基本的经验教训。

一、必须彻底克服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制定并执行符合国情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三次经济调整都是由经济过热引起的，经济过热的主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急于求成的倾向。这一点集中地表现在制定和执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上。“大跃进”时期，制定和执行的是不切实际的“超英赶美”的发展战略，粉粹“四人帮”后的两年，执行的是“大干快上”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党的“十二大”上提出了本世纪最后二十年，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发展战略，这是一个基本正确的发展战略，但在实际工作中，又明显偏离了这一发展战略。正是由于战略上的失误和偏差，引起经济过热，产生一系列的经济问题，而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经济调整。为什么会产生急于求成的倾向呢？其主要原因是：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上看，都缺乏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对大力提高生产力的艰巨性认识不足；我党受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较深，在革命和建设上，易犯急性病，往往片面地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客观规律的作用。近年来，党中央提出了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使人民得到较多实惠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我们必须彻底克服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认真执行这一发展战略。为此，我们必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充分认识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克服主观主义，尊重客观规律。从根本上讲，必须努力提高全党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思想理论水平。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二、必须改革旧的经济体制，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体制。

经济过热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旧的经济体制中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其弊端之一，就是在投资方面，资金是无偿使用，物资由国家调拨，于是大家纷纷争资金、争物资。这样就必然导致投资膨胀，引起经济过热。在这种体制中，还缺乏一个科学化、民主化的决策体系，这也是造成经济过热的原因之一。如1958年炼1070万吨钢的决策、1978年搞十来个大庆的决策、1988年闹物价关的决策，既不民主也不科学，造成重大失误。第二次调整以来，我们已对旧的经济体制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在探索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体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在改革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和偏差，结果又导致了新的经济过热和秩序混乱。只有继续深化和完善经济体制的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三次调整，已将治理整顿工作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如何根据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体制，已成为正在探索中的重大理论课题。从汲取历史教训的角度出发，在建立新的经济体制时，必须建立起防止膨胀的投资体系，必须建立起科学化、民主化的决策体系。

三、必须合理地确定和安排国民经济中的重大比例关系。

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经济规律，它要求在实际管理上合理地确定和安排国民经济中的重大比例关系，如农、轻、重的比例关系，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如前所述，国民经济中重大比例关系失调是几次调整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调整国民经济中的重大比例关系是几次调整的主要内容之一。所以，为了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我们必须合理地确定和安排国民经济中的重大比例关系。

在三次经济过热中，曾先后出现了重工业的过热、加工工业的过热，而农业不仅没有过热，反而处在过冷的境地；在三次调整时，都注重扶持农业生产，使农业得到较快的发展，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所以，我们在确定和安排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时，必须真正重视、大力加强和发展农业。长期以来，我们在口头上也承认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一直说要大力加强和发展农业，但在实际工作中远远做得不够。从指导思想上看，我们一直偏重于以调整生产关系来发展农业生产，而对增加农业投入，发展农业科技则重视不够。从支农方向上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增加了一些财力来支援农业生产，但这些财力主要用于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而没有大力支援农业的基础建设。目前，农业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中最薄弱的环节，我们必须在指导思想和支农方向上，进行适当的调整，真正重视、大力加强和发展农业。

四、必须注意保持财政、信贷、物资、外汇各自的和相互之间的基本平衡。

保持财政、信贷、物资、外汇各自的和相互之间的基本平衡是国民经济工作的基本任务和基本方法。“一五”时期，十分强调保持国民经济的宏观平衡，特别是四大平衡。其中虽然也曾出现过轻微的失衡，但都很快自觉地调整过来。“大跃进”时期，认为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从一般的哲学概念出发，否定了一系列的平衡；1978年，不顾国力搞大规模的引进；八十年代中后期，提出“财政赤字无害论”，“通货膨胀有益论”，这些都破坏了四大平衡。几次经济调整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恢复四大平衡的过程。纵观建国后四十多年经济建设的历史，可以看出，凡是保持了这些平衡，国民经济就能够顺利地发展，而失去了这些平衡，则必将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五、必须不断优化经济结构，大力提高经济效益。

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和经济效益较差，是我国国民经济中长期存在着的问题。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导致资源的浪费、效率的低下，这就必然影响到经济效益。由于经济效益较差，产出的增加主要是依靠增加投入，提高速度来实现的。片面地增加投入，追求速度，必然导致经济过热现象的发生。经过总结四十多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我们对国民经济中存在的结构问题、效益问题，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已成为第三次调整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当然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是

一项长期的工作,不仅在调整时期要重视这项工作,在调整结束以后仍然要常抓不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强调指出,要“在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步战略目标^①。

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紧密依靠人民群众。

加强党的领导,紧密依靠人民群众,是胜利完成调整工作的根本保证。加强党的领导,首先要求全党端正调整的指导思想,提出并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调整时期,既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存在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又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解决问题,并在实际工作中迈出新的步伐,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是不可能完成这些任务的。加强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纪律。经济调整,必然要在各行业、各地区之间进行项目的上与下、保与压,这就要求各行业、各地区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认真执行党中央的重大方针、政策,绝不能为了局部的利益,而消极应付,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加强党的领导,必须切实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调整时期要注意把实际经济形势,克服困难的办法,今后的发展前途,告诉人民群众,以增强信心,鼓舞干劲,提高广大党员和群众执行调整政策的自觉性。加强党的领导,紧密依靠人民群众,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共渡难关。在六十年代初的经济调整时期,曾涌现出王进喜、焦裕禄这样的优秀党员干部,当时他们的事迹教育和感染了广大的干部和群众,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和学习他们的精神。加强党的领导,紧密依靠人民群众,还需要充分发扬党内党外的民主,努力造就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胜利完成调整工作而奋斗。

经过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特别是经历了三次调整的曲折,我们已初步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但是“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②。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还将遇到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还有许多领域有待于我们去探索。只要我们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我们的实践,注意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就一定能够逐步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逐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

注释:

① 1952—1987年的经济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年鉴》(1988),下同。

② 1988年的经济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关于198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下同。

③ 1989年的经济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关于198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下同。

④ 1990年的经济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关于199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下同。

⑤ 《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第13页。

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简编》，第124、127页。

⑦ 《人民日报》，1991年1月29日。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61页。